

学习资料之五

廉政文化读本

中共晋城市委
学习讨论落实活动办公室

2014 年 12 月

序言

廉政文化读本

中共肇庆市委

肇庆市纪委监委

2023年12月

目 录

廉政思想篇

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	(3)
(一)民本	(4)
(二)崇德	(6)
(三)公廉	(7)
(四)慎刑	(9)
(五)尚贤	(11)
(六)节用	(12)
(七)教化	(15)
(八)监督	(17)

廉政名人篇

中国古代廉政名人	(29)
勤政律己的诸葛亮	(29)
公正廉明的狄仁杰	(31)
心正无邪的杜甫	(33)
为官如清水的包拯	(34)
心忧天下的范仲淹	(36)
廉洁奉公的欧阳修	(38)

清贫宰相司马光	(39)
耿直清廉的苏轼	(41)
两袖清风的于谦	(42)
“三不”清官海瑞	(44)
清官第一于成龙	(46)
居官清正的张伯行	(48)
情系百姓的郑板桥	(50)
中国共产党人廉政楷模	(52)
清贫奋斗一生的方志敏	(52)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55)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59)
为民清廉奉献的杨善洲	(62)
永葆本色的申纪兰	(66)
晋城清廉典范	(70)
视民如伤的程颢	(70)
明四大清官之首的杨继宗	(74)
“清正明臣”李瀚	(77)
“公正至善”毕振姬	(79)
“清官第一”毛一豸	(81)
“清好能德”陈廷敬	(83)
“清谨公方”田从典	(86)
人民作家赵树理	(89)
太行山上焦裕禄——孙文龙	(92)

廉政诗文篇

历代廉政诗词	(97)
硕鼠(节选)	(97)
古诗(其一)	(98)
咏怀(节选)	(98)
座右铭	(99)
咏钱	(100)
赠友人(其二)	(100)
咏史	(101)
诗三百三首(节录)	(102)
不寝	(103)
放鱼	(103)
赠内	(104)
书端州郡斋壁	(105)
秋日偶成	(106)
题灯	(106)
辞汤庙诗	(107)
病牛	(107)
题青泥市萧寺壁	(108)
示二子	(109)
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诗告之	(110)
和曹东谷韵	(110)

薛明府去思口号	(111)
山坡羊·叹世	(111)
醉太平·讥讽小利者	(112)
题礼盒	(113)
咏煤炭	(113)
无题	(115)
石灰吟	(116)
离任	(117)
无题	(118)
绝句	(119)
四绝句(选二)	(119)
言志诗	(120)
喻世明言(摘录)	(121)
乙卯春题书雪堂	(121)
麻雀	(122)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122)
竹石	(123)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124)
咏兰(节选)	(124)
七古·手莫伸	(125)
七绝·怀屈原	(126)
历代廉政格言	(127)
历代廉政楹联	(131)

廉政思想篇

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

中华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伟大民族。中国古代的廉政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先秦典籍《尚书》就赞颂了尧帝勤政、节用、爱民、尚贤的为政美德,强调了为官“九德”的要求,闪烁着“民本”思想的火花,提出了“贪”与“廉”两种对立的价值观。舜帝在古代被誉为“德圣孝祖”,以其丰富的施政活动以及嘉言懿行,开创了我国以德治国的先河。春秋战国之际,既是诸侯征战不休的时期,又是我国廉政思想文化闪耀理性光芒的岁月。诸子百家纵论治国安民之道,呈现出百家争鸣、各有建树的创新局面。儒家倡导礼治王道,主张仁政,崇尚清廉,反对贪欲,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理念;道家倡导崇俭抑奢,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对后世遏制贪腐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借鉴意义;墨家的兼相爱、节财用理论及“俭节则昌,淫逸则亡”的主张,更是对官僚集团纵欲奢靡危害的震耳提醒;法家则认为统治者应该赏罚分明,廉洁自持,防微杜渐,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农家则主张君臣并耕而食,反对横征暴敛。先秦诸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苛政贪贿奢侈亡国毁家的危害,强调为政者必须清正廉洁,崇廉除私,以天下为公,并进一步提出“敬天保民”、“民贵君轻”、“德

主刑辅”、“举贤尚功”等治国理念。到秦汉时期,国家的廉政框架基本构建起来,选官机制、考核制度、监察机构得到强化。汉代进一步建立察举制、刺史巡部制。隋唐之际,国家的廉政体系进一步健全,建立了任职回避制、科举取士制。宋辽金元的国家廉政建设多元拓展,制定法律,严惩贪官。明朝注重整饬吏治,整顿纲纪,重典惩贪,完善监察机制。清朝沿袭明制,崇尚俭约,奖廉惩贪,宽严相济,创新实施了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这些都反映出中华先哲们治理天下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历代明君贤相治国安邦的深谋远虑,凝聚着古往今来清官廉吏的实践智慧和价值追求,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概略来讲,中国古代廉政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一)民本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其重要的廉政文化资源。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萌发于西周,兴盛于春秋,形成于战国,发展在秦汉,为历朝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所遵循。这一思想的核心是“以民为本”,概括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八个字。所谓“民本”,就是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众,失去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社会就会出现动乱,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推翻。民本思想,主要表现在重民、爱民、亲民、养民、信民、惠民等方面,构成了以民为本的总基调。基于此,优秀的政治家找到了执政为民、为民请命的理

论支撑、道德杠杆和实现治国安邦抱负的立足基点；开明的执政者看到了民众蕴藏的智慧力量，从而在施政上更加注重民众的创造力和积极作用。

肯定民众主体地位。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肯定民众的主体地位，抓住了廉洁从政的根本，虽然它是不完善、不系统的，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有本质的差别，但在历史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孕育着现代民主思想中主权在民的胚胎。据先秦文献记载，民本意识在商周时代初露端倪，“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念，说明很久以前中国古代的先哲就已认识到民众的重大作用，认为君来自民，没有民众，国君无所依托。“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吕氏春秋·用众》）。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提出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可贵观点。基于这种认识，孟子主张民众要有恒产，君主要保民而王，让民众拥有基本的生产、生存资料，指出：“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讲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统治者必须顺应天意民心，如果违背，上天是可以剥夺统治者权力的，并提出了“限民名田”，抑制兼并，轻徭薄赋，以宽民力等措施，进而得出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的结论。

重视民众历史作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注重民众力量，

深刻影响了治国理政方向。对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的估量,虽然诸子百家和统治者因立场、地位有别,导致观念有所不同,但随着社会治乱兴衰的实践发展,古代开明统治者和思想家都充分认识到决不可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所以,早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治家如箕子、微子、比干、周公等都提出尊重人民才能统治长久的思想,即统治者要做到“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当时思想家们对夏商前期爱民、末期暴民的两种结果进行比较,得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的结论,总结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规律,成为古往今来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座右铭。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正是在这种民本思想的引导下,历代开明的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若干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与民休养生息、反对横征暴敛、防治贪污腐败的政策措施,从而促成了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的出现。

(二)崇德

中国古代政治中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以德治国。德治思想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其后历经孔孟、董仲舒、程朱等儒家大师的发扬光大,重德尚贤被统治者奉为治国的圭臬。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和提炼,重德思想成为治国用人的价值规范。先秦思想家们都强调提高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

养是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前提。为官者自身廉洁,国家廉政建设就有保证,基础就牢靠,同时也是社会廉洁风气形成的基础。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政治的腐败、社会贪婪风气的形成,都是与为官者的言行举止密切相关的。《虞夏书》就记载了启动氏族议事会监察的制约功能,论及选举有德之人才为官以及无德者犯罪、归罪、惩凶等问题。上古的尧舜时期已经产生了廉政自觉,留下了千古传颂的民主议事、君主禅让、推举“有德者居其位”的廉政经验。周公吸取商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孔子和孟子认为统治者重德尚贤,以道德治理国家,以礼乐教化人民,只有施行德治,人民才会信服,才会真心拥护,才能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和道德感召力,才可以使人们自我规范和约束,才会自觉地知耻而不去做危害国家的坏事。东汉统治者倡导“德本法用”,将“修德立化”作为治国之本。司马光主张以德用人,提出:“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的观点。程朱从道德理性的高度审视两宋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把德治思想放到治理国家的突出位置,要求通过实施德治达到固本强基的目的,对外抵抗异族的入侵,对内政治上宽民、经济上惠民、思想上教民,从而把德治思想推向一个新阶段,并发挥了长远的影响。

(三)公廉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思想。崇公

尚廉、公而忘私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坚持的行政伦理。历史上开明君主大都希冀官员忠君爱国,勤政为民,把公正品德和廉洁行为贯穿于施政过程,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的贤相良臣和清官廉吏,进而消弭社会矛盾,建立永久稳定的清明王朝。一些有抱负的封建士大夫也把公道明察、廉洁清正的人格品质和政治实践作为毕生追求,通过践行公廉思想为国尽忠,为民造福,从而升华自己的思想道德情操以流芳千古。

公而忘私是从政品质。远古的尧舜之所以被称颂为圣君,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帝位禅让贤明,受到人们的敬仰和爱戴。尽管后来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征战、残暴、攻伐,但正是这种无休止的争夺更激起人们对大公无私的渴望。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兵荒马乱年代的思想家痛感公道思想的沦丧,要求人类回归天下为公的正道。孔子为此设想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荀子认为:“公生明,偏生暗”。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参照当时各国现实出发,认为秦国从西北边陲小国一跃而成为问鼎中原、统一六国的强国,其重要原因在于秦国上下都能为公无私,团结一心,出入公门,无有私事,不比周、不朋党。《吕氏春秋》也讲“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太平矣,平得于公”。明代薛瑄在《从政录》中说道:“人心公则如烛,四方上下无所不照。”公而忘私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只有一心为公,心底无私天地宽,廉政才能实现。所以说,官员具有大

公无私的思想境界和公而忘私的优良品行,是政治清明,风清气正,社会和谐的前提。

廉洁不贪是为官之道。廉洁奉公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廉是前提,《周礼》对官员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的六计考核要求。可见,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是其他品质和能力的基础。《管子·牧民》篇讲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段为官箴言的碑文至今一直被人们传颂。公廉思想孕育出包拯、于谦、海瑞、于成龙等一批清官廉吏。清代清官张伯行的《禁止馈送檄》,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动,令人肃然起敬:“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豪,民之脂膏。宽一分则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四)慎刑

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有机的统一。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主流是重德而轻刑,反对严刑酷法,主张礼法合治、刑以弼教。思想家们认为,司法腐败为害尤烈,三尺王法的天平一旦失衡,冤假错案便会大增,社会将失去公平正义的底线而陷入无序和动乱,人民反抗暴政的时刻就会到来。因此,完全依靠刑罚不可以治世,统治者必须省刑简政,“任德而远刑”,主张慎刑爱民,珍惜人的生命。西汉统治者总结秦朝法峻刑苛的教训,吸取儒家慎刑爱民的思想,建立了录囚制度,

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西汉州刺史或郡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就是核实、监督和检查下级司法机关决狱情况一项制度。到了东汉,皇帝亲自录囚。永元六年汉和帝曾亲自到洛阳录囚,并将非法拷打狱囚的司隶校尉降职处分,体现了爱民慎刑的执政风格。唐朝对囚徒的权利保障作了法律规定,并建立了改判、重审、三司推事等制度。宋朝进一步完善了大案奏裁制、审判分离制以及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制度。明朝对死刑命犯的处置更加慎重,不仅完善朝审、大审,重大案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会审制度,而且死刑命犯行刑处决前都要经过皇帝朱笔钦定勾判。清朝再定秋审制度,人命要犯也需等到立秋霜降后才能处决。这都反映了立法、执法均应审慎对待,人命关天,严防司法腐败和草菅人命的现象发生。

同时,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家极力主张罪刑法定,王法面前人人平等。早在周代已有罪刑法定之争。《管子·法论》把“罚不避亲贵”作为立国治世的三大根本之一;《商君书·赏刑》提出任何官吏都没有法外特权,“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强调刑无等级之分,“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在汉代文献已有记载。晋代刘颂在上疏中说:“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已经包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这些都是对封建宗法等级社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公开挑战,体

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宋代《庆元条法事类》明文规定：“诸犯罪未发及已发未论决而法改者，法重听依犯罪时法，轻从轻法。”这应是刑法时效上最早的概括性“从重兼从轻”原则，有利于保护民众的权利，比1787年美国宪法和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的规定要早近600年。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了不少执法如山，刚正廉明的清官廉吏。东汉光武帝时“强项令”的董宣，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包拯、欧阳修、范仲淹，明代的都御史顾佐、按察使周新、杨继宗、大理寺卿薛瑄、应天巡抚海瑞、御史杨继盛，清代的清官于成龙、孙嘉淦、魏象枢、张伯行等都是不畏强权、执法如山的典例。正因为有一批敢于打破封建等级制的陈规，冲破刑不上大夫权贵的陈旧观念的人，才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得到张扬，老百姓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五）尚贤

“尚贤”就是尊重和任用贤德之人治理国家。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用一贤人则众贤毕至，用一奸佞小人则祸国害民。因此，极力倡导“选贤任能”，营造“廉洁爱民”的政治氛围。西周杰出的政治家吕尚指出，“贤人所归，则其国强；不肖在位，国受其害”。他还具体阐明了荐举贤能的标准及赏罚办法，认为君主应该挑选具有“仁、义、忠、信、勇、谋”六方面操守的贤才；摒除“大兴宫室土木、不务农桑、交结朋党、自负清高、轻视人君、强宗欺夺”六类贼人；清除“无智谋、无实